

阵痛

中国历代变革得失

ZHEN TONG ·

ZHONGGUO LIDAI BIANGE DESHI

亢建明

著



新华出版社

阵痛

中国历代变革得失

ZHEN TONG •

ZHONGGUO LIDAI BIANGE DESHI

亢建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阵痛：中国历代变革得失/亢建明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2

ISBN 978—7—5166—0865—4

I. ①阵… II. ①亢…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11616 号

阵痛：中国历代变革得失

作 者：亢建明

出 版 人：张百新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责任编辑：刘 飞 唐波勇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160mm×230mm

印 张：1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865—4

定 价：29.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导言：一群仰望星空的人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角度看，中国数千年社会发展的形式和状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被动进化”，另一种是“主动进化”。

“被动进化”主要表现为一种“结构性进化”（或者叫“激进变革”），就是由于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导致整个社会“破坏性重构”或“摧毁性再塑”，如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等不可确定因素而导致的政权更迭或改朝换代。

“主动进化”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表现为“自然性进化”，就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明成果的转化而导致生产工具的逐步改进，从而使得生产力进一步解放，进而推动社会整体向前发展。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催化性进化”，就是一个国家以思想解放为前提条件，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以调整生产关系为手段，整个社会（尤其是上层建筑）在思想文化自省自警“雷达”导引下，不断进行自我校正社会发展方向和自我调整社会发展步伐和节奏，进而在吐故纳新和与时俱进中把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跨越性”地向前推进。

从这个角度讲，“催化性进化”是人类社会较理想的发展模式。因为这种方式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吧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在保存中扬弃“刷新”，另一方面还能保证社会结构和性质在与时俱进中始终处于最佳进化状态。

而促使社会发展“催化性进化”的，正是中国历代改革变法的推行者，如中国历史上首个睁眼“看天下”的人——春秋时期齐国丞相管仲



推行的“相地而衰征”强国方略，使弱小的齐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国力强盛，使齐桓公成为以“拳头说话”的霸王江湖——春秋时期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江湖霸主”。

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催化性进化”的发展模式。

其实，在管仲所处的那个时期（前 770—前 476），正是国家秩序急剧调整期，当时世界各国都在以不同方式（甚至是极端激进的）寻求各自社会发展之道。

在亚洲，巴比伦王国已完成从古巴比伦王国——中巴比伦王国——新巴比伦王国的急剧转型；以色列正逐渐从“士师时代”向“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进化；远在东瀛的日本人正悠闲地漫步于原始亘古“绳纹时代”，印度大地则迎来从恒河文化转型而至的“古代印度”文明的灿烂曙光。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亚洲各国还都处于“自然性进化”阶段，而在遥远的非洲大漠和欧洲大陆，则是另一场景：在亚述铁骑于前 671 年以血腥与武力征服埃及的同时，逐渐强大的波斯帝国也对雅典发动了“马拉松战争”，接着，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又发生了长达数百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从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角度看，这就是典型的“激进性进化”的发展形态。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以战争和暴力为代表的“激进性进化”发展形态应该大大逊于同一时期东方大地齐国所进行的“催化性进化”。

值得注意的是，倡导这一思维的管仲正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能动认识”，基于人的因素之于客观世界改造方式和手段的“科学发现”，在对齐国国情国力、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理性研判”后，为这个“幸运”而“知进”的羸弱国度破天荒地谋划了旨在强国富民的改革“顶层设计”。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这一改革实践，为世界（尤其是中国）后期的历朝历代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极具

“真理性模范”样本，具有极其宝贵的“昭示价值”。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已超越那个时代。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遥远的东方智慧更是值得我们后人自豪的。

在管仲推行变法的春秋中后期，中国迎来了思想文化领域空前大融汇、大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以儒家、墨家和法家等为代表的思想流派（史称“诸子百家”）如雨后春笋般在神州大地各领风骚而“百家争鸣”。可以这么讲，这个因思想大碰撞、大剧变而产生的新思潮新学说之火花氤氲而成的异彩纷呈的伟大时代，直接影响着其后即将到来的战国时代的诸多国家的“国运走向”。

这一时期，思想大裂变的“余热”在各国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对流”中继续发酵，一大批旨在富国强邦的学说代言者纷纷登上各国政治舞台，从而在各国引发新一轮思想深刻而广泛的政治变革：

继为改革请命的法家斗士商鞅在秦国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后，申不害在韩国通过以“革”促“改”和以“术”治国的改革的智慧为这个“夹缝之国”寻找战略生存法则；在楚国，屈原以封建文人士大夫特有的“信仰与主义”为楚国急修《宪令》，在自己深爱的故邦乡国激起了层层改革浪花；在魏国，法家学说的代言者李悝为这个历经坎坷的“始立之国”谋就了千秋鸿猷，成为史上唯一成功实现改革理想的法家精英。

至此，在这一时期，由思想解放引发的图强变革方阵形成。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变法推行者们是幸运的，因为一方面在其之前有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改革和诸子百家思想交相辉映，这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模式参照”和思想支持。另一方面，基于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战国时期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强兵兴邦作为最高“国家意志”，这客观上为诸多学说流派推行者们提供了最理想的“改革实践”。

在如此一个广阔舞台上，他们可以意纵高天，放手一搏，通过实现自己的改革抱负而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而到了西汉，改革家晁错的运气就不那么幸运了，在这个“国家利益被地方集团利益绝对绑架”的改革语境下，他在坠茵落溷中演绎了一出史上最让人唏嘘的改革悲剧。

同样是在这期间，在春秋氤氲而生的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思想杂芜被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旨意”而改变轨迹，中国变革之燭从此被掐灭，其结果是千“思”一统，中国历史从此在“文化自宫”中缓缓前行，进而使中国少了变革的“加速度”。

在其后，凭借显贵的出身和皇太后的庇护，王莽篡夺了西汉政权，建立了“新朝”。在其统治的十五年中，王莽推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改制”运动，但由于他推出的药方的“副作用”太大，最终以失败而收尾。但总的来说，作为一代封建君主，王莽身上所体现的“变”革精神和思路还是值得历史肯定的。

与其相比，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成功变革，则在历史长河中为属于自己的时代书写了最灿烂的亮丽一笔。这位首次让一个国家在“思想解放的雷达导引下腾飞”的改革之君，不仅让自己的国家社会在他手中完美进化，而且在历史拐点深处完成了“华丽转身”。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北周大地也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改革之星”——周武帝，这位在与时俱进中不忘励精图治的图强国君，为这个时代筑就的是一个“史上图强变革的标准样本”。

与此同样精彩的好戏在其后的五代后周大地上演，周世宗——这位英年早逝的有为草根天子，以其特有的强国情怀投身于使命改革，即位之后，他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为这个百废待举的国度殚精竭虑，在为日后龙起的赵宋王朝穿嫁衣中匆匆走完昙花一现的图强人生，成为掠过历史乱世苍穹中的“耀眼流星”。

从以上变革成功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国家要进步，社会要发展，关键是执政者首先要解放思想，在此前提下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研判评估和“国内”国情国力的“持筹握算”。由此在国家决策最高层面形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甚至是强

制执行）改革方略，推动国家整体发展，这是国家改革的“首要条件”。

第二，多国天下分治，各诸侯国就必须考虑到在列强环伺中“策略性争雄”。也就是说，这种“危机意识”正是其力促国家改革的动力之源，如此前的战国时期，基于国家未来发展命运，拓展生存空间的需要，诸多国家形成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变革潮”。

与其相似，其后的南北朝时期，甚至到了五代时期，这正是各国成功改革的“必要条件”。在五代十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高密度巨朝时代”。

我们这里讲的“高密度”，主要是指这些朝代在更替过程没出现因“大治之后大乱”局面。我们这里讲的“巨”，一方面是从“空间之大之广”角度考察的。我们知道，中国自秦以来，一共出过九个大王朝，它们是：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另外，还出过五十几个小王朝。这些朝代的疆域面积有大有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大疆域面积的朝代，必是“巨朝”。如元朝的疆域面积为 1680 万平方公里，明朝的疆域面积为 710 万平方公里，清朝的疆域面积为 1310 万平方公里，这是史上各国都不曾拥有过的“之广之大”。另一方面，“巨”还可以从“时间之长之久”角度考察。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的存在时间都有几个世纪之久，如宋 319 年（北宋 167 年，南宋 152 年），清 295 年（1616—1911，1636 年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清”，1644 年清军入关，1911 年清亡），明 276 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此一个社会结构与形态在巨朝之间整体“无缝对接”，这正是中国历史一大特色。

还有，从改革发展角度看，这些“巨朝”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拒绝变革。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一是大凡时逢变革之年，多是在这些“巨朝”的中后期，这期间的统治者多是在前辈手中顺利接过的统治权杖，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打江山”者，而是“守江山”者，这期间国家一统，江山社稷基本安稳，只要无灾无害，国家就能在其手中“万世永昌”，他们则能四平八稳走

完“万岁人生”，如同温水中的青蛙一样没有危机意识，他们自然不会有强国富民进取之志，这是从改革动力角度分析的。二是他们拒绝变革，因为这会打乱整个国家社会节奏和步伐。就局部情况看，虽然某些零件出现故障，但还影响不到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但这时如果系统性地“更换零件设备”，新旧机器之间如果不能有效“磨合”，则会导致“车毁人亡”悲剧发生。这是从变革成本角度分析的。三是我们知道，所谓变革，实际上是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大博弈，大调整，这必然会有诸多阻碍。因为纵观中国历史，每一个朝代社会阶级关系都是在“强霸弱忍”的日将月就中约定俗成地形成“惯性规则”。

在如此各方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背景下推行变革，必然会出现消极因素，由此引发的不可控制的社会大动荡在所难免，这是统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他们没理由，也不可能忍受“变革之疼”，只能拒绝变革。这是从变革风险角度分析的。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如发生在北宋年间的“庆历新政”（因领导者为范仲淹，故又称“范仲淹变革”）。宋仁宗时，官员数量骤增，土地兼并加剧，国内危机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辽与西夏军队不断对宋侵扰，岁币和军费开支有增无减，国家财用日绌。因此，官僚士大夫中不断有人提出革新主张。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向宋仁宗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条改革方案（史称《十事疏》）。但由于当朝统治者政治无能，使得国家利益被某些小集体利益“绑架”，导致如此一把改革薪火沉溺于“时”与“势”浪涛之中，最终以“杂草挤走良苗”——范仲淹被排挤出朝廷而告终。

这也道出了“弱宋”的悲哀与“宋弱”的某种因果必然。当然，历史地看，此次变革虽然失败，但这为之后的王安石的全面变革奠定了必要的“思路参照”。

接下来，同样是在这一时期，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

家”——王安石推行了“影响一个时代”的“熙元变法”。后人把这次变法，评为中国历代影响深远的“四大变法”之一，并位居其首。（另外三大变法是指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和北魏孝文帝改革）在这一变法构想中，他从“改革财政制度”、“发展农业”、“巩固国防”和“人才培养”等四方面谋划了一个震古铄今的“大宋熙元时代”。

现实地看，这是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革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变革。这次变革是封建地主阶级针对北宋统治危机进行的，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危机。在新法推行之初，他就遭到反对者之间的“利益结盟”而孤立和长期地反复地排挤争斗，从而使他陷入老是在朝中被孤立被批评的局面。但他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如此一碗“改革浓汤”被这群守旧者们白白弄“懈”了，实在令人惋惜、痛心。

在其之后的明朝中期，也同样出现了一位和他的“变革当量”相当的人物——张居正。从一个人在历史社会中的“存在价值”看，这位连任十年之久的大明庙堂内阁首辅，不仅凭借个人的勤奋修为和砥砺自进，成功入仕俸禄，演绎了完美无憾的人生辉煌；更以“进则广济天下”的封建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和以政治家的为政使命推行了旨在挽救明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变革。

按照他的变革构想，在内政方面全面施行“考成法”，其目的是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在经济方面，他力推“一条鞭法”，目的是开源节流，增加税收；在军事方面，任用戚继光等，加强了边防；同时加强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

从此，明朝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史料记载，在此后的二三十年时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推行的“一条鞭法”不仅解决了逃役问题，而且为赋税制度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促进了货币化纳税，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甚大。



对于他的“存在价值”，明代思想家李贽称誉他为“宰相之杰”。史料记载，在万历时代的为政生涯中，他虽在京贵为宰相，但却孤身一人长期远离故土和亲人，为国为民操劳一生。与他同时代的著名清官海瑞高度评价他“工于谋国，拙于谋生”。

这就是说，如此一个“工于谋国”的“宰相之杰”——张居正为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可谓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而令人痛惜的是如此一代能臣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把他深爱的国家推过一个“小山坡”后，他一系列变革措施在那个昏庸无能的万历皇帝手中成为一张废纸，张居正死后，明朝又重新回到亦步亦趋的“跛脚时代”。

此时想来，无不让人感到“寒冷”和“纠结”。

同样的“纠结”（确切地讲应该是“悲剧”）也发生在离我们最近的另一个朝代——清，在距今一个世纪零一十六年前的1898年9月28日这一天，因维新派向大清最高统治者力推强国变法主张，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结果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于这一天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从影响这些历代巨朝国运走向的变革事件背后，看到范仲淹、王安石和张居正以及“戊戌六君子”们这一个个以封建士大夫特有的信仰精神、道德指引、大性砥砺和大德修为，而他们前赴后继勇擎“为改革请命”、“为改革而杀身成仁”变革大旗的精神和勇气是何等的气贯长虹！

此时此刻，我们思考是什么让这些改革者们前赴后继以“飞蛾扑火”般的勇气与主义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许可以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去寻找。

古人云：“天之所生，地之所养，天地合气，人以稟天地气生，并为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人而有生，所重乎者心也。心为一身之主宰，万事之根本。”这是《黄帝内经》中一段话，大意是说，自然万物

是“天地”化育而来，其质性物理必有其“用”，而人作为万物之灵，我们“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也就“必然”会成为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份子。这种“偶然”与“必然”在其因果关联中演绎出不同的人生际遇。而这些“为变革而生”的改革家，自然要在他们的那个时代“物尽其美”。

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这是“生逢其时”，因为那个时代有可咀嚼的五味陈杂的“改革之馍”，他们以时代先行者的身份匍匐在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地，以思考的眼光俯视那个时代；他们用思想解放的“张韧因子”和变革图强的凝聚元素结成最佳强度的“弹性限度”，把自己所热爱的国家的邦运国势最大限度向前延伸。

但对他们来说，他们又“生不逢时”，因为那个时代不容他们，他们的思想已超过那个时代，但现实又不能脱离于那个时代。

从另一个角度讲，那个时代有这些改革者，是一种“幸遇”，因为有了这些人来匡扶世道，就能把社会发展的脚步摆到正轨，把发展方向拨正。让那个时代在改变其发展道路上的“速率”和“速度”的同时，更能让我们在经受头顶的天空一闪而过的“思想霹雳”中领略其变革之魅。

而对于那个时代来讲，则是一种“不幸”，因为大凡变革之年，必是一个急需重典大治的不平之世。所谓变革“圣人将出”，必是“时代之需”，他们的任务是应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现世之需”，把一切阻碍时代前进的附赘悬疣蛛网尘埃“草薶禽猕”。

此时此刻，我们还在思考，我们应该怎样来审视这些在那个时代“惨败但更悲壮”的变革事件？

难道他们的“强国表达”不能对今天仍跋涉在改革之路的我们有所感悟么？

难道我们还会用所谓的“成”与“败”这两个简单苍白的普通词汇来表达么？

难道我们不能从他们为改革而颠沛流离的身影、微弱的呐喊和傲立



于时代之巅的思想孤寂中所思所想点什么？

难道我们不能从他们的改革实践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进而得到一种宝贵的现实昭示和思想启蒙么？

是的，新生命总是在母体阵痛中艰难诞生，改革也同样如此，我们可以从商鞅、晁错和“戊戌六君子”们的悲壮中看到甘龙、杜挚（商鞅变法中守旧势力的代表）之辈的窃喜和得意，看到汉景帝（暂杀晁错的最高决策者）的麻木和冷漠，看到慈禧的血腥和冷酷，但这些最终都被碾碎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之下的绊脚石都没能阻挡历史发展的脚步。

这就是说，任何阻碍时代发展的“螳螂之臂（辈）”，都必将淹没在不可阻挡的时代大潮中，历史最终必将在那些历代改革者们抬头所视的方向发展。

回望中国几千年发展史，我们可以从历代这些推行改革者组成的方阵中，看到有封建帝王，有布衣卿相，在他们所推行的改革或变法设计中，有的是基于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有的是基于地主阶级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变法、李悝变法等。有的是少数民族封建化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机改革、清初皇太极改革等。有的是封建社会内部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

此时此刻我们在想，假如这些改革家的愿望都能实现，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圆显他们强国夙愿，用眼前的现实来证明当初的“假设”。

这就有个问题：面向未来，我们应有什么样的“改革观”？

我们认为，这种“改革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在此基础上，强调改革的目的不仅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解放人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内容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涉及社会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全面变革。改革的手段不仅要看效率，更要问公平。

可以肯定，今天的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迎来了中华复兴之光，

并将在深化改革与时俱进中走进中华民族的复兴时代！如果说，今天的我们对思想解放是解放什么思想，思想解放是如何解放，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同时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改革观”等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没统一到全面深化改革大思路上来，那么，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去读懂这些通体绽放改革之魅的时代，读懂这些“仰望星空的人”。

目 录

导言：一群仰望星空的人·····	(1)
一 管仲：中国历史上首个睁眼“看破天”的人·····	(12)
(一) 用“观星的眼”看破社会发展之“天机”·····	(12)
(二) 用思想解放之燭在愚蒙世界中燃起“东方亮”·····	(15)
(三) 管仲变革的启示·····	(16)
二 赵武灵王：中国“洋务”第一人·····	(26)
(一) 弱国当有强君出·····	(27)
(二) 战略崇洋——“强赵”之途的最佳捷径·····	(29)
(三) 科学“拿来”——“赵强”之梦显圆的最终必然·····	(31)
(四) 赵武灵王变革的启示·····	(34)
三 申不害：“夹缝之国”寻找战略生存法则·····	(38)
(一) 一代大家坎坷崛起·····	(38)
(二) 以“术”立国的“救时”之相·····	(41)
(三) 科学改革思想在韩国社会变革中的成功·····	(42)
(四) 申不害变革的启示·····	(44)
四 李悝：“始立之国”谋就千秋鸿猷·····	(47)
(一) 几经砥砺，师从儒学的法家鼻祖·····	(47)



(二) 唯一成功实现改革理想的法家精英·····	(48)
(三) 李悝变革的启示·····	(54)
五 商鞅：为改革请命的法家斗士·····	(58)
(一) 一位变革者的独自奋斗·····	(58)
(二) 悲怆凋谢的法家之花·····	(66)
(三) 商鞅变革的启示·····	(68)
六 晁错：史上最让人唏嘘的悲剧改革家·····	(72)
(一) 书生问政，他为大汉带来“强国方略”·····	(72)
(二) 恃君自重，最终被皇帝出卖的替罪羊·····	(75)
(三) 晁错变革的启示·····	(76)
七 王莽：“悲壮失败”的社会改革家·····	(85)
(一) “愤青国君”的“乌托邦”梦想·····	(87)
(二) 大力改革却造就短命王朝·····	(91)
(三) 王莽变革的启示·····	(93)
八 孝文帝：在思想解放的雷达导引下腾飞的改革之君·····	(98)
(一) 鲜卑血 汉族魂·····	(98)
(二) 他让一个国家在历史拐点深处华丽转身·····	(100)
(三) 历史在他手中完美进化·····	(105)
(四) 孝文帝变革的启示·····	(108)
九 周武帝：史上图强变革的标准样本·····	(109)
(一) 强君应有强国策·····	(109)
(二) 周武帝变革的启示·····	(118)

十 隋文帝：西方人眼中最伟大的中国皇帝·····	(121)
(一) 历史拐点深处的改革亮光·····	(122)
(二) 他缔造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强国传奇·····	(127)
十一 周世宗：乱世中的短暂亮光·····	(132)
(一) “草根天子”的改革情怀·····	(134)
(二) 周世宗变革的启示·····	(137)
十二 范仲淹：沉溺于“时”与“势”浪涛中的改革薪火·····	(141)
(一) 应“时”而生的强宋方略·····	(141)
(二) 因“势”而溺的改革薪火·····	(143)
(三) 杂草挤走良苗——弱宋的悲哀·····	(145)
(四) 范仲淹变革的启示·····	(155)
十三 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	(158)
(一) 他拿来一个强国安邦的“顶层设计”·····	(158)
(二) 他寒心地端走一碗被泯的“改革浓汤”·····	(163)
(三) 历史只能选择王安石·····	(167)
(四) 王安石变革的启示·····	(169)
十四 萧太后：思想解放不分男女，巾帼一样能撑改革的天·····	(178)
(一) 辽国出了个萧太后·····	(178)
(二) 铁腕肃政·····	(180)
(三) 她抓住了“低成本”改革的最佳时机·····	(185)
(四) 萧太后变革的启示·····	(186)
十五 金世宗：隐没在历史深处的思想亮光·····	(189)
(一) 明君出山·····	(189)